

元代文坛：多元格局形成与地方力量推助^①

——以江西乡贯为中心

邱江宁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对于元代文坛多元格局的形成，江西乡贯文人的作用明显，而这又以江西文人对南北一统、文化多元政治现实的认同为前提。作为王朝一统进程中人口增长最多、数量最大的地域，江西在文化上也获得极大繁荣。滋生其中的江西乡贯文人深省顺处，力以务实观风态度，涵容博取。其所推动形成的平易正大风格，正有以黼黻多元文化包举并存的时代氛围。

【关键词】 元代文坛；江西乡贯文人；多元文化共存；务实观风

【中图分类号】 1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 (2017) 04-0065-16

在元代文坛多元格局构建与形成过程中，江西乡贯作家的作用颇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宋金、蒙宋将近两百余年的战争中，江西基本不是主战区，成为各区域移民迁人的中心，江西竟由此跃升为元代唯一一个人口突破千万的大省，文化亦得以获得极大进展。滋生其中的江西乡贯文人以观风务实理念为创作基础，主张深省顺处，涵容博取，力求以多元包举、平易正大的风格敞敞时代。在现有的元代诗文研究中，不乏对元代江西文人群及单个作家的研究^②，却鲜有论文将江西乡贯力量作为核心视角来观照江西人在元代多元文坛格局

中的意义与贡献。

一、移民多元汇聚与元代江西文化的繁荣

在元代，江西是唯一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省份，这在江西历史上前世未有，后世再无。^①与此同时，江西在文化上亦获得极大发展，在政治、哲学、宗教、地理、文学艺术、语言等多个领域都有突破，尤值得注意的，这些领域的杰出者无不立足多

¹收稿日期：2017-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15BZW-052）

作者简介：邱江宁（1973-），女，江西南城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元明文学。

①本文研究所涉江西指今天江西省的范围，文章所列举江西文人以生活于江西者为依据，如程钜夫祖籍为湖北，虞集祖籍乃四川，但皆生活于江西，而欧阳玄虽自认为江西庐陵人，但生活在湖南，本文便不将其列为考察对象。元王朝至元末行省划分稳定后的江西行省，共辖18路、9州、13个路属州和78县，辖境跨越南岭南北，包括今江西大部 and 广东大部。《江西通史》卷七“元代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②李超所撰论文，多篇涉及元代江西文人群研究，而大量的博士、硕士论文涉及诸如虞集、揭傒斯、范梈、吴澄等单个江西文人的研究。

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展示出平易正大、务实包容的时代典型特征。

纵观宋金战争以及蒙元王朝由西北逐步下江南的一统进程，非常令人惊诧的是，江西从北宋崇宁元年（1102）人口总数的4487530跃升到元代至顺元年（1330）的14524190^②，宋、金、蒙之间将近200年的割据战争，竟然让江西实现了千万量人口的突破性增长，成为元代人口最多的大省。江西人口在元代的激增，与元王朝南北大一统前多地域人口大量聚迁江西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可以分宋金战争和蒙宋战争两个阶段来观照江西人口的增长情形。

靖康之乱到南宋初期，是中国古代移民史上空前绝后的北人南迁时期，而江西是其时移民人口最多的省份。^③这些移民的来源，有东北流民，李纲在南宋初期的奏折中指出靖康乱后“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1]册1126, 257}淮南民众，在蒙古第一阶段的南征战役中，两淮大受冲击，淮南民众大批进入江西，仅嘉熙三年（1239），经由江州进入江西的移民便达十余万人；^{[2]12429}南宋宗室，南宋初，宋金之间对峙形势颇严峻，考虑到金军即将入侵，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安排“隆佑皇太后率六宫宗室近属，迎奉神主，前去江表”，并派一万名军人护送，而且高宗要求，“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2]466}以此大批百姓随南宋宗室迁入江西；此外，随金朝势力逐渐减弱，大批归正军南下，其中大量归正北军退役人员多留居江西。诚如虞集所言，宋金战争后，南宋“阻江以为国”，江西凭借“群完地博，土沃而民安，去临安近而无险”的优势成为其时贵臣大家迁徙的优选区域，^④这为江西文化的多元融合发展奠定了宽厚基础。

蒙古攻宋期间，从1251至1259年间，江西全境除西部少数区域遭受蒙古军短暂的攻击外，其余州郡都未被侵扰，而且，次年（1260），宋廷还蠲免了江西被兵州郡的夏秋两税。在之后1260-1279年蒙古攻宋的进程中，江西一方面由于不在蒙古人攻宋的主战场，再加上大部分区域抵抗相对较少，所以江西全境在蒙古攻宋过程承平依旧。相对太平的环境使得江西再次成为四川人东迁和江淮人南迁的主要区域，像虞集家作为蜀州大家即由此迁入江西抚州地区。由于人口众多，财税丰厚，江西也因此成为元王朝皇帝忽必烈一系宗王、勋旧的主要封赏区。元朝分拨给宗王、勋臣的民众计7999279户，江西地区有46200户，占总计58%；而且江西的封户主要是分拨给元朝最尊贵的宗王、勋臣，以忽必烈家族为主，江西封户总共有839250户，忽必烈家652250户，占总计78%，皇太子真金的封地就位于江西的核心地区隆兴（今江西丰城）。以此，不仅大量蒙古、色目人通过管领封地而进入江西区域，其他为求官、求学、求商的人们亦由此大量涌入江西区域^①，促使江西区域成为其时多元文化汇聚的中心区域。而江西人也的确在诸如政治、哲学、宗教、历史地理等领域以务实包容的气度表现突出。

①按：本文所采用的人口数据以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为依据，而袁氏统计的省域范围基本以今天的省域划分，包括台湾共27个区域。据袁氏统计，元代之前，隋朝时候的江西人口数为428362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为0.9%，排名第13位，唐朝时，江西人口数为1746139人，占比为2.9%，排名第11位；北宋时，江西人口数为4487530，占比为9.8%，排名第2位。元代之后，明代的江西人口数为6505232，占比为14.4%，排名第2位；清朝时，江西人口数为20085270，占比为5.8%，排名第9位。参见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3-380页。

②按：袁祖亮以《元史·地理志》到顷元年（1330）统计人口，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域范围为本，元代的江西人口统计范围含：饶州路、信州路、铅山州、江州路、南康路、龙兴路、瑞州路、袁州路、临江路、抚州路、建昌路、南丰路、赣州路、吉安路、南安路、徽州路中之婺源州，共计户数2600661，口数14524190，参见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6-26页。

③按：江西的移民数量仅次于当时的江南，不过南宋时的江南所指范围较大，包括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部分和上海市，浙江省，南宋属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建康府、宁国府、太平州、池州、徽州和广德军；江西即指今江西省，南宋属江南西路及江南东路的信州、饶州、南康军。而今属江西省的婺源其时属于徽州，不在计算范围内。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金宋元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6-327页。

④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金宋元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1页。

（一）政治领域：程钜夫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②3}

至元十三年（1276），代表最高文明水平的南宋臣服于元廷的事实也使得南北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其时各种社会问题的核心：一方面，元廷对南宋治下区域的冷漠与排斥使得南方士大夫晋升无门，没有政治前途可言；另一方面，元廷与南方的隔膜也使得元廷无法真正据有南方，令东南财富无法有效输与北方政权。当此之际，江西南城人程钜夫抓住忽必烈为首的北庭渴求真正拥有南宋治下区域财富的心理，站在南北融合的政治高度尽力斡旋。程钜夫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南北风俗不一，如果朝廷只用北人，便不能“谙悉各处利害”、“周知远人情伪”，朝廷必须公选“南方晓事鲁旧及清望有风力人员”，“与北方官员同共讨论区画”，^{[3]109}才能令南方真正一归于治。程钜夫的努力使忽必烈终于认识到江南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的必要性，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特命用蒙古字、汉字书写访贤诏，令程钜夫江南访贤。北廷释放的政治信号以及程钜夫江南访贤的切实行为最终推动了以赵孟頫为首的南方士绅文人大举北上的进程。

对于元王朝来说，没有程钜夫的努力，他们就不算真正拥有南方；对于元代的馆阁建设而言，没有程钜夫的努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不会有赵孟頫、袁桷、揭傒斯等一批南方精英的北进，元代多维政治与社会文化格局中会因此缺少代表着最高农耕文明水平的南宋治下区域文人的参与；对于南方社会而言，没有程钜夫的努力，或许南方文人群体的入仕进程，以及元代延佑二年（1315）的首次科举工作还要推后一些年。而没有这些前提，元王朝不能算真正的统一，某种程度而言，没有了高度发达水平的南方文明的参与，元代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许不会绽放异彩。

（二）哲学领域：吴澄与元代理学的宗朱融陆

观照吴澄的思想体系，实质与他的同学

程钜夫一样，也同样立足于现实社会，以融合为基本理念，表现出根底于朱子之学，同时又肯定陆九渊思想积极性的“朱陆和会”思想。吴澄认为“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在吴澄弟子虞集看来，吴澄的学术路径“辩传注之得失，而达群经之会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阃奥。推鬼神之用，以穷物理之变；察天人之际，以知经纶之本。礼乐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据援引，博极古今，各得其当，而非夸多以穿凿。灵明通变不滞于物，而未尝析事理以为二。使学者得有所依据，以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标指，以为归宿造诣之极”。^{[4]册26, 173-175}他不是拼接朱陆，而是博及百家学问之后的宗朱融陆。这种学问理念和学术路径，是吴澄立足元代社会多元文明并存的现实基础上的“愈广大而愈精微，愈精微而愈广大”^[5]，其之于社会的影响力，“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浅深，致效之远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为”^{[4]册26, 173-175}。

有元一代的哲学体系，依据《宋元学案》的看法，是许衡、吴澄还有刘因的天下，^{①4}然而，正如时人揭傒斯所指出的那样：“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6]册28, 505}刘因一直沉沦民间，又过早去世，影响甚微；真正分庭抗礼、为南北学者之宗的是许、吴二家。许衡奠定了元代哲学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基本局面，而吴澄也以不存门户之见的胸襟，藉由学术的精深、博大、融朱汇陆理念，使得元代学术发展方向更多地依赖于他。

（三）宗教领域：重熙累洽的江西道教异军突起

①参见吴小红、钟起煌《江西通史·元代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41页。

②参见邱江宁《程钜夫与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197-207。

①按：《宋元学案·静修学案》黄百家云：“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耳”，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王梓定《宋元学案》，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51页。

产生于江西龙虎山的道教在元代被称作玄教，其势力和影响在元代达到巅峰。延佑二年（1315）、至元五年（1339）张留孙、吴全节七十寿辰之际，其时皇帝皆命宫廷画工“肖其像，使宰执赞之，识以明仁殿宝而宠之，赐宴于所居崇真万寿宫。近臣百官咸与，大合乐以饗，终日乃已”，^{[7]1008} 尊荣极于一时。

从第一代获得元廷特权的张留孙开始，玄教首领即重熙累洽，致力于交结大臣故老，心腹之臣以及馆阁名流。第二代教主吴全节，较其师父更深悉多元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各种差异与缝隙，弥缝期间，尽力作为。吴全节“交游之贤，盖不得尽纪也”，其所交结“若何公荣祖、张公思立、王公毅、高公防、贾公钧、郝公景文、李公孟、赵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俨、王公约、王公士熙、韩公从益，诸执政多所谐访。阎公复、姚公隧、卢公挚、王公构、陈公俨、刘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矩夫、赵公孟顺、张公伯纯、郭公贯、元公明善、袁公桷、邓公文原、张公养浩、李公道源、商公奇、曹公元彬、王公都中，诸君子雅相友善”，这些人既还既有来自北方的金源文人、亦有西域文人；有政治家、经济学家又有艺术家、文学家；有活动家。无论对谁，吴全节都“荐引善良，惟恐不及；忧患零落，惟恐不尽，其推毂之力，至于死生患难，经理丧具，不以恩怨异心，则尤公之所长也。”^{[7]1012} 玄教这种立足现实，尊重多元文化共存互融的理念，既为自身教派的发展赢得上升空间，更为南方文人在北庭的权益争取尽了力。

不仅是在政治、哲学与宗教领域内以多元融合态度取得卓著成绩，江西人在历史、语言、艺术等多个领域无不立足多元文化并存的客观现实，以多元包举的理念来实现其在相关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例如江西人在历史地理领域，基于宏阔的天下意识而取得该领域的斐然成绩。延佑七年（1320），临川人、玄教道士朱思本积十年之功，绘制完成《舆地图》。该图“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不仅第一次将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考察黄河河源的成果反映在地图中，而且博采群言，随地为图^{[8]册 31, 381-382}，通过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等的接触以及当时扎马刺丁所带来的地球仪，将其时的世界地图标画出来^{①5}，直观地展示出朱思本对元代社会疆域辽阔，交通便捷、文化多元特征的深切体认。再如南昌人汪大渊至正初刊行的地理纪行著作《岛夷志略》，载有99个国家和地区，提及地名达220个，是中古时期关于太平洋西岸、印度洋北岸区域地理著作之最杰出者。相比元以前每空谈见闻的地理志书，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表达自己博览天下、见识世界的眼力与胸襟。也正是得益于对时代多元文化的深切认知，高安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南人而广纳北音，不仅是音韵学的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更是为多元地域文化交融的现实世界提供了可供共同参据的语音系统，被时人誉为“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词，不惟江南，实当时之独步也”。^{[9]册 59, 356} 还有元代的经典艺术象征——元青花瓷，出自江西景德镇。源于多元文明交汇并聚的历史机遇，元青花瓷借助当时独产于波斯南部的苏麻离青特有的晕散效果，揉合中原书法体现在宣纸上的水墨意蕴，更汇聚蒙古、波斯、汉文化以及其时独有的八思巴文字等多元文明的审美意趣，将中国陶瓷从素瓷带入了彩瓷时代，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传统时代里，文化的巨大发展和繁荣往往离不开人口基数的支持。多地域移民汇聚的历史背景使得江西人口在元代激增至全国第一，成为其时唯一的千万人口大省，这为元代江西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元代江西人在政治、哲学、宗教等多个领域立足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格局，努力以包容态度翻越时代的作为也印证了人口多地域流动与汇聚的意义。对于元代文学尤其是诗文的发展而言，江西地域移民多地大量汇聚、文化繁荣的现实，也将江西文人群推到了格局多元的元代文坛中心。

二、多元融合创作理念与江西文人的创作实践

与之前的所有王朝相比，南北一统的元王朝，“西至乎玉关，东至于辽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10]册 46, 136} “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11]册 53, 292} 而国家疆域辽阔、气场强势的情形也使得元代士林对于亡金、旧宋时代的萎靡衰疲弊习心生痛恶，慨然欲以复古救时弊。在努力开新时代创作风气，力矫旧弊的文风变化进程中，江西文人对现实的深省顺处，务实观风的创作理念

①按：李约瑟曾指出朝鲜人在1402年画出的《混一疆理图》以朱思本《舆地图》为蓝本画出，并认为朱思本图得到了不同地域和民族人们的帮助。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54-159页。

与实践贡献甚多。

首先是程钜夫致力于南北融合的文风革新努力。作为元王朝第一代南人官员，程钜夫以大一统王朝的理念为南方融入大元王朝而奔走呼告，也以南北一统的理念重塑新王朝的思考方式与思维视野。这种理念还体现于程钜夫对文风改革的期待。在《李仲渊御史<行斋漫稿>序》中，程钜夫清晰地指出，朝廷和时代呼唤新的文章风气：“我朝之盛，自古所未有，独于文若未及者。岂倡之者未至，而学之者未力耶？今天子方以复古为己任于上；弘其风，浚其流，懔焉而任于其下者，非我辈之责耶？”^{[3] 181-182}新的文章风气应该迥异于前朝，在《送黄济川序》中，程钜夫尖锐批评前朝士习认为：“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至于宋之季，极矣。”程钜夫认为儒家经典著作实际也是讲求务实的，“《六典》之经邦国，《大学》之平天下，于理财一事甚淳悉也”，所谓“士大夫顾不屑为，直度其不能而不敢耳，诡曰清流，以掩其不才之羞”^{[3] 157}。在程钜夫看来，作文应该务实，以事功为主，力图从文风的务实、融合理念出发，逐步破除前朝清谈、虚文的弊习，要求开新大元创作风气。基于务实的创作理念，他主张诗歌当具有“观民风”的作用，认为“诗所以观民风。凡五方、九州、十二野，如《禹贡》、《职方》、司马迁《货殖》、班固《地理》之所载，其风不一也，而一于诗见之”。^{[3] 155}程钜夫这种立足时代，务实观风的创作理念吻合了游牧民族务实的文化心理，也符合多元文化融合的元代社会创作需要，遂成为大元诗文革新的重要基石。相比于同样务实的金源新理学派许衡、姚枢及其弟子们，程钜夫作为南人，更高瞻远瞩的地方在于他致力于大一统王朝的南北融合问题。至元二十三年（1287），当程钜夫将南方优秀文人赵孟頫举荐给忽必烈时，遭到时任中书省的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的阻挠。程钜夫据理力争，致使忽必烈欲将耶律铸赶出尚书台。^①
⁶ 皇庆二年（1313）的科举开科讨论中，程钜夫建言：“经学当祖程颐、朱熹传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12] 4017}程氏所提出的文章要革除唐宋宿弊之论，与在座的元仁宗的老师李孟建议中提出的“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说法相呼应，程钜夫代表南人，李孟代表北人，最终元代科举考试内容采纳程氏的建议，“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13]程钜夫这种从思想认知上溯清归正的统一理念，会相当程度地屏蔽读书人因曲学异说而导向辞章华丽之途的倾向，却可以有效地去除金朝、南宋文风中尚辞章、逞意气的弊端，也为南北文风统一指明了方向。

其次是虞集基于多元融合现实而展示的创作理路。虞集是程钜夫的同学吴澄的学生。基于多元融合的社会现实，虞集在创作理念上期望人们能深省顺处，去除逼仄忿厉的情绪，用涵容博取的态度来完善自己的创作修养，做到“与造物者同为变化不测于无穷焉”，^{[7] 499}以“涵煦和顺之积，而发于咏歌”。^{[7] 490}在创作路径上，虞集认为散文应该以古文为宗，“主之以理，成之以学，即规矩准绳之则，以尽方圆平直之体，不因险以见奇也；因丝麻谷粟之用，以达经纬弥纶之妙，不临深以为高也”；诗歌、韵文创作方面当以性情为主，“陶铭粹精，充极渊奥，时至而化，虽若无意于作为，而体制自成，音节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14] 册 54, 365}在创作风格上，能呼应多元交融的时代，既不刻意作诡异之言来骇人视听，也不故作赛墩逼仄之态来显得奇特古拗，更不恣肆放纵使得自己偏离情感的本原，做到“辞平和而意深长”^{[7] 569}其实稍早于虞集而在大都成名的浙江人袁桷也针对前金、故宋之弊指出：“方南北分裂，两帝所尚，唯眉山苏氏学。至理学兴，而诗始废，大率皆以模写宛曲为非道。夫明于理者，犹足以发先王之底蕴。其不明理，则错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而委曰吾唯理是言，诗实病焉”^{[15] 册 23, 243-244}，认为应该消弭经学与文艺的壁垒，二者融合，摆脱南宋以来文艺创作逼仄怨忿、萎靡卑下的创作格局，形成能与时代盛世相媲美的雍容大气之态。相较于袁桷的探寻思考，虞集博约综合，萃集时代思想精华，体现出了与大一统王朝气象相呼应的创作理路。

其他再如吴澄，他在《吴闲闲宗师诗序》中认为吴全节诗歌之所以值得肯定的原因在于：吴全节生当“四海一统之时，际重熙累洽之治”，又具有“出人禁阔，晨夕清光；历仕六朝，眷握如一”的人生履历，所以吴全节创作之际能够做到“太和之气贯彻于身，表里冲融”，“其气益昌，太和磅礴，可使畏垒之民大壤，可使藐姑射之物不疵”，其创作内容因为携四海见识，融多元气象，往往能“字字鸣国家之盛，诣于英茎咸韶之乐”，“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16]

①按：耶律铸为阻挠启用赵孟頫，曰：“赵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之左右”，程钜夫则启奏说：“立贤无方，陛下盛德，今耶律乃以此幼臣，将陷臣于不测”，元世祖云：“彼竖子何知”，然后转头让人传旨二要求立刻将耶律铸赶出尚书台。见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全元文》第25册，第580页。

册 14, 364-365, 吴澄对吴全节的肯定, 也是从多元融合的现实背景和作家丰沛冲融的胸襟角度来期待创作的成功的。

在程钜夫、虞集等江西文人努力经营之前, 元代正统文坛由金源文人所主持。以姚燧为核心的北方优秀文人, 基于对前朝囿于一隅而形成的逼仄格局的不满, 力图从经文合流的角度力扭文风, 并得到元明善、张养浩、李术鲁种等北方作家的追随与支持, 从而基本确定元朝文风转变的方向。而包括程钜夫、赵孟顺、袁桷、虞集等一大批南方文人北进, 汇入到北方优秀文人文风革新行列之后, 最终促使元代形成以经为本, 涵容百史百家, 古雅、正大的创作风格。值得注意的是, 《元史》不设“文苑”而列“儒林”传, 认为元代文艺总体上是经学与文学合为一体, “元兴百年, 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 下及山林布衣之士”, 真正以文通显于世的人是“通经能文”者,^{[13]4313}既非纯经学之士, 也非纯文艺之人。这种创作态势的形成虽不只是江西文人的贡献, 但可以看到, 程钜夫、虞集等江西文人的创作理念在元代文风革新过程中与有力焉, 贡献非小。

元王朝作为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 在忽必烈获得可汗之位的《中统建元诏》中即确立祖述中原帝制、接受农耕文明先进管理经验的宗旨; 但同时, 忽必烈王朝也对海洋文明所具有的巨大活力深感兴趣, 明确谕告周边海洋国家, 期望往来互市。应该说, 与元王朝多元文明背景相呼应的文学创作具有视角多维、多元浑融的特征。在元代文学多元融合这一维度中, 江西文人的诗文创作贡献了相当精彩的内容, 尤其以虞集的诗文创作为最。

作为元代中叶奎章阁学士院的从二品侍书学士, 虞集接触了元王朝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 见识了那个时代文化所能贡献出的最优秀、最广博的内容, 而他也竭尽所能, 力图全面展示, 以符合那个时代混一天下、海涵四境的恢宏气象。借助虞集的诗文, 可以强烈地体会到元王朝疆域的广袤辽阔、政体的复杂性、民族人群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多元性、社会地位的多层级性、文化教养的多面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 等等。

就疆域的广阔而言, 元王朝以征伐而得天下, 自崛起朔漠开始, 到“并西域, 平西夏, 灭女真, 臣高丽, 定南诏, 遂下江南, 而天下为一”,^{[12]1345}疆域由西北而江南, 号称旷古所未有, 如虞集奉旨写的《句容郡王世成碑》。天历元年(1328), 对元文宗即位具有翊戴之功的燕帖木儿希望将其祖父土土哈的事迹著成文字, 刻为碑石, 虞集遂奉旨作文。借助虞集这篇文章可以看到蒙古帝国时代, 钦察部如何并入帝國的历程:

钦察之先, 武平北折连川安塔哈山部族也。后迁西北, 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风刚悍, 其人勇而善战。有曲年者, 乃号其国曰钦察, 为之主而统之。曲年生唆末纳, 唆末纳生亦纳思。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 火都奔亦纳思, 遣使谕取之, 弗从。及我师西征, 亦纳思老不能理其国。岁丁酉, 亦纳思之子孙忽鲁速蛮自归于太宗, 而宪宗受命帅师已及其国, 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众来归, 从讨蔑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 南取宋, 其种人以强勇见信用, 掌当收之事, 奉马湏以供玉食。马湏, 尚黑者, 国人谓黑为哈喇, 故别号其人哈刺赤。日见亲近, 妻以哈纳郡王之女弟纳论。中统初元, 讨阿里不哥之乱, 班都察与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 土土哈领其父事, 是为句容郡王武毅王。^{[7]1018-1019}

钦察人是由突厥乌古思人及部分东胡(蒙古系后裔)构成。王族为玉里伯牙吾氏, 同蒙古、康里及女真诸部中的伯牙吾氏是同一个氏族的分支。据虞集这段文字知道, 钦察人的祖先居住于武平(今内蒙古赤峰宁城), 后来迁徙到西北玉黎北里, 《元史·土土哈传》云“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 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 因以为氏, 号其国曰钦察”, 《元史》所载与虞集所记在译音上稍有出人。由虞集的叙录知道, 太祖成吉思汗征略蔑尔乞, 蔑尔乞部头领逃入钦察部并受到保护。结合《元史·土土哈传》来看, 钦察部保护蔑尔乞部头领的行为招来了成吉思汗对钦察部的攻打“太祖乃命将讨之。亦纳思已老, 国中大乱”。^{[12]3131}再由虞集的叙录可以知道, 在元太宗丁酉年(1237), 钦察部头领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帅部投降蒙古帝国, 并转而攻打蔑尔乞。在接下来的蒙古人攻打大理、南宋的进程中, 钦察人凭借部落刚悍强勇的性格越来越被蒙古人所信任, 遂被命令掌管自牧之事, 专门为蒙古贵族提供马湏。^⑦由于马湏色泽以黑色为上品, 而蒙古语, “黑”音哈刺, 于

①按: 马湏, 即马乳, 亦指用马乳酿成的酒, 即马奶酒。彭大雅《黑鞋事略》载“初到金帐, 鞑主饮以马奶, 色清而味甜, 与寻常色白而浊、味酸而擅者大不同, 名曰黑马奶。盖清则似黑, 问之则云, 此实撞之七八日, 撞多则愈清, 清则气不擅, 只此一次得饮, 他处更不曾见, 玉食之奉如此。”彭大雅《黑鞋事略》,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第 13 页。

是钦察人被蒙古人别号“哈刺赤”。中统初，在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汗战争中，忽鲁速蛮的儿子班都察、孙子土土哈皆有功，因此班都察死后，土土哈承袭父职，最终封为句容郡王。虞集的记述不仅简要地展示了蒙元帝国丰富的征略进程，更解释了元朝钦察部族的迁徙以及钦察人与元蒙王朝的关系，其间还涉及民族语音、民族特色食物等内容，让人深刻感受到疆域广阔性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人种、物产、语言等内容的多元性。

毫无疑问，蒙古人的每个征略过程都意味着毁灭和缔造。作为重要馆臣，虞集广泛地接触和见识了元王朝建国历程中汉地世侯、金朝旧臣、南宋故家、元朝勋臣以及西域各族史事，他的文章也般般尽现，极为复杂多元。像虞集的《杨氏番禺莹域碑》即叙录了南宋故家、虞集的外祖父杨文仲家的事迹。文章写道：“宋之亡也，君臣走海道以死；我外祖眉山杨公讳文仲，以工部侍郎、给事中、集英殿修撰在行而卒焉。……侍郎葬潭州”，^{[7]1150}据《宋史》载，“元兵渡江，畿甸震动，朝士多弃去者，侍从班惟文仲一人”，^{[2]12687}而杨文仲在追随小皇帝赵昺南海逃跑的过程中去世，杨家子孙亦在国家沦亡过程中散落各地，虞集慨然叹曰“山民峨绝天，万山之宗。转而西南，海门纳容。我思外家，万里至此。丧乱既平，远有孙子”。^{[7]1151}其实也不仅是杨家，在元王朝建立过程中，毁灭的文明以及断嗣的族裔，包括西夏、金朝、南宋等王朝的故家无以数计，细读虞集作品，能深刻体会到他对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的叙录中所包含的喟叹与感慨。就如虞集笔下独产于西夏的黄羊尾毛笔。虞集《黄羊尾毛笔赞并序》写道：

西北之境有黄羊焉，玉食之珍品也。西夏之人，有取其尾之毫以为笔者，岁久亡其法。张掖刘公伯温，尝命笔工之精技作而用之，果称佳妙。其修史著廷，盖尝用之。中朝之士，咸为之赋。^{[7]327}

虞集的这段序言表达了相当多维的文化内涵。西北之境本是西夏的国土，但西夏是蒙古人攻打金朝的障碍。自成吉思汗1205年率部第一次攻打之后，1206年成立的蒙古国又于1207年、1209年、1217年、1221年、1224年对西夏发动五次大规模战事。成吉思汗在1226年的攻夏战争中死于六盘山，以此1227年西夏被蒙古人亡灭之际，蒙古人对西夏进行了几近于地毯式的洗劫与屠杀，毁灭的不仅是灿烂的西夏文明，甚至连西夏国最主要的民族党项族也因此消亡。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虞集的这段文字，就能真正感受到元王朝多元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历史沧桑与血腥覆灭。西夏国所拥有的西北境内盛产黄羊，汉化程度相当高的西夏人利用黄羊尾毫创制的羊毫笔，工艺精湛，堪称时绝。而这种羊毫笔的制作工艺随着西夏国的湮灭而失传。文中的张掖刘公伯温，是西夏人沙刺班的汉名，他是虞集的学生，曾筑室，名曰“学斋”，并著有《学斋吟稿》。对于自己亡灭的家国，沙刺班费力寻求笔工，恢复黄羊毫笔的制作，并将之赠送给史馆同仁，请他们为之赋咏。多元文明融合进程中的身世家国之叹，细物中所揉合的多族文人相互琢磨各自文化背景的场景，借助虞集这段简省却蕴藉的文字娓娓现于眼前，令人愈读愈叹。

以民族的多元性而言，元蒙统治者根据征服区域的先后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们都知道元代色目人群相当复杂，其实元代所谓汉人的族源也相当多元。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虞集的《高鲁公神道碑》即叙录了女真族的复杂族源与姓氏情形。文章写道：

公系出女真，以高为氏。奎章阁艺文监垂绝石烈希元，与公同出女真，亦以高为氏，状公世家、岁月、子孙尤备。臣又得考而载焉。女真之地，东接高句丽，西迤燕云之北。分族此石居之，各为部落，非郡县，无市井杂处者。故其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称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钮祜禄），曰纥石烈（赫舍哩），曰李术鲁（富珠哩），抑或为高氏，公盖渤海部之高也，先莹在辽东凤凰山，金时碑刻具在，多贵爵，位太师者一人，节度使者十人。^{[7]1050-1051}

上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是作为南方文人的虞集通过同事、女真文人纥石烈希元才弄清楚写成的，所涉内容极为复杂。元朝对女真族的政策施行“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12]268}的政策，成为汉人的女真多改女真姓氏为汉姓。虞集笔下的纥石烈，源出唐朝时期“鞋鞞三十姓”之一的“纥石列”，到金朝时称“纥石烈”，在女真族中属于“白号之姓”，即贵族之姓。据《金史·百官志》记载，纥石烈在金朝73个白号贵族姓氏中位列第十三位。纥

石烈，汉语语义为“高”，所以纥石烈在元朝时大多改为高姓。由虞集的文章可以知道，元朝时期女真人的活动区域东接高丽，西近燕云之北，即今天的北京、天津北部。人们分族而居，同族中，人们又根据自己的名字、爵号、官职、故里来别以姓氏。以高为姓氏的女真族有渤海、女希烈（钮祜禄），曰纥石烈（赫舍哩），曰学术鲁（富珠哩），还有些姓高的人氏，虞集笔下的传主高皓来自渤海高氏。另外，纥石烈姓氏以辽东为郡望，高瞩家的先莹在辽东凤凰山，则高皓家在金朝应该是位望甚高的贵族，所以虞集在文中交代高瞩家族在金朝多贵爵，有太师一人，节度使十人。

应该说是元王朝多民族、多地域、多种族的典型文化特征使得虞集诗文能在观风务实的理念支撑下，题材广泛多元，内容丰富深邃，完全无愧于他“卓然为一代之所宗”^{[17]册55, 239}的文坛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虞集的这份识力与胸襟，令人赞佩。值得引为比较的是元代中晚叶东南文人中影响最大的杨维禎。顾嗣立云：“延佑、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领导，则廉夫（杨维禎）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18]1975-1976}，“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19]册1458, 161}，杨维禎可谓元诗四大家之后，元代晚叶在东南一带影响最大者。但从多元文化融合理念的表达视角来看，这种影响愈大愈未必值得乐观。与虞集相比，成就杨维禎最多，也是他最大的缺憾，在于其人生大多数光阴都避处东南一隅，这使得杨维禎的诗文尊崇自我，却颇少周览天下、包容多元的雄浑气质。至正三年（1343），以《辽》、《金》、《宋》三史开修，杨维禎作《正统辨》上表进呈。据载，至正二年（1342）三月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奏告纂修宋、辽、金三史，起初儒臣们围绕三史谁为正统论辩不休，其时，总裁官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20]，于是《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工作立即开始，“越二年，甲申（13科）春三月，进《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金史本纪》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1345）冬十一月，进《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21]册42, 485}而杨维禎的《正统辨》意见并未被采纳。览观杨维禎文章，虽长达“二千六百余言”，咻咻不已的却只有华夷之辨：

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琴，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于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追耶律光，而其执浸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九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僧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夫何今之君子，昧于《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拂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21]册42, 487、}

490

尽管杨维禎承认元王朝大一统的现实，该文写作的目的是表明“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的主旨，而且就善于文字书写的作者人数而论，当日支持杨维禎“宋为正统”言论的人必定超过支持“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人，但就元王朝立国的多民族社会基础，就其时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或者就每个民族自身的丰富性而言，身处元王朝的杨维禎若依旧以鼻息之态傲视辽、金，缺乏多民族间相互尊重的胸襟与格局，则又何望其以平和的态度去讨教同事关于女真族的源流，以客观的态度来叙录钦察部落的兴起，甚或以哀悯的态度描摹亡灭的西夏人曾经的辉煌呢。杨维禎以诗才奇逸凌越一时，其所引领的铁雅诗派在元末明初东南文人中亦影响巨大，但若立足于元季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现实而论，则稍逊虞集一筹。

爬梳虞集的仕宦人生，与蒙元王朝开国之初的耶律楚材、刘秉忠辈相比，虞集不曾涉足西域，也不曾西南、漠北随君征略。与姚燧、王恽、马祖常、元明善辈相比，虞集作为南人则仕进稍显艰涩；而与同来自南方的赵孟頫、袁桷、邓文原辈相比，虞集后先期间，难分伯仲，这些元代南北大家却没有谁在创作面的多元深广方面可以与虞集匹敌，这可能得益于时代赐予虞集的绝佳机遇，^①但更得益于虞集与时江西人共同的文化与创作理念，那就是，立足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现实，深省顺处，力求

在务实观风的基础上，平易正大地翻越时代开阔盛大的氛围。

三、江西乡贯文人在元代文坛的影响

综观元代文坛，伴随着元王朝“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12][1345]}的一统进程，元代文坛实质是一个不断有着不同力量的参与并不断重新组合的多元框架体系。以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江南访贤为分界点，之前的元代文坛是以金源文人为主导的北方文人的天下，程钜夫江南访贤之后，南方文人大举北进，元代文坛成为真正南北大一统的文坛。^{②⑧}而江西文人从馆阁到山林，从方外到民间，除了程钜夫、虞集外，揭傒斯、范梈、危素、周伯琦等为代表的馆阁文人接替有序，释大诰、吴全节、朱思本等为代表的方外之士以及吴澄、刘壘、刘辰翁和刘将孙父子等民间山林之士亦副翼其间，影响广大。

就江西文人的馆阁影响力而言，从元初馆阁的建立到元王朝退出中原，江西文人在多元力量构建的馆阁影响一直称著于时。元代至元时期的馆阁，几乎是北方金源文人的天下，程钜夫鹤立其间，鼎力周旋。大德后期，随着金源文人如胡祇遹、王恽、王构、阎复、姚燧逐渐淡出，程钜夫在文坛的主盟地位日渐显著，到皇庆二年（1313）决定南北士子命运的元代开科讨论，即由元仁宗老师李孟与许衡之子许师敬以及程钜夫三人主持讨论。李孟、许师敬不以文章显著，而程钜夫遂成大名于文坛，其时天下显要文章多程钜夫书写之，“类朝实录、诏制、典册纪之金石、垂之竹帛者，多公所定撰。至于名山胜地、遐荒远裔，穹碑钜笔，亦必属之公焉”。^{[3]474}秉持多元融合、观风务实的理念，故见于程钜夫文集中诸如凭“金纫玉切，土木生辉”、“巧妙臻极”的工艺技术而获封凉国敏惠公的尼泊尔王后裔阿尼哥，^{[3]79-80}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获封秦国公的景教徒爱薛；^{[3]57}推动少林寺走向中兴、被元廷追封为晋国公的雪庭福裕和尚，等等，诸色人等，各种事件，无不“昭晰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风庆云”。^{[3]511}元代至元时期国家斯文事业程钜夫每每主持、倡议之：“立朝三十余年，立冒监教条，征南中遗逸，颁贡举程序，凡国家斯文之事，奚自公倡议焉”；^{[3]510}于是，天下文章风格逐渐以程钜夫为准心，“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作士气，词章议论为海内所崇尚者四十年”；^{[3]477}文坛人心亦倚程钜夫为重“大名震乎海内，鸿名行乎中朝，盖南北人士倚以为吾道元气者”。^{[3]488}作为一代词臣，程钜夫并非浪有虚名。

程钜夫在皇庆二年（1313）科考讨论之后，因年龄和身体原因逐渐退出文坛，而此时的馆阁创作力量堪称极盛。无论金源还是西域，又或者来自南方，大量优秀文人彬彬郁郁其间，最名至实归的“当代之巨擘”^{[22]216}非虞集莫属。至大、延佑期间，“诏告册文，四方碑板”基本由虞集撰定，时人评价认为：“先生绝学追千古，一树寒梅压众芳”。^{[7]1272}即便虞集致仕回到江西后，朝廷若“欲考典礼之逸遗，以尽乎一代之制作”，还是“必以公为归”^{[14]册54, 362}可见其影响力。除了虞集，1314年，揭傒斯、范梈等江西文人也相继来到京师，与在朝的馆阁文人们“以文墨议论与相颉颃”。^{[23]册30, 178}揭傒斯是程钜夫看中的文学接班人。揭傒斯认为，元王朝统一之后，程钜夫开启且推动了整个元王朝文风“归于厚”，这所谓的“厚”是基于多元文化并存现实的融会贯通的粹粹浑厚。揭傒斯本人也努力通过文章来践行这种“归于厚”的作文理念。举一段揭傒斯的文章为例：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然金亡四十三年，宋始随之。许公居王瓷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在江南，居陷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6]册28, 505}

这是揭傒斯为吴澄撰写的神道碑的首段，也是综观元代儒学发展面貌，比较吴澄与许衡之间区别的重要文字。作者既能站

①虞集作为《经世大典》的总裁官，大量接触元代自立国至1329年前近百年有关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载记；又作为重要馆臣，朝中著作大事多有参与，而功臣、勋戚、诸侯世家事迹未尝不曾尽览，参见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②参见邱江宁《程钜夫与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197-207。

在统一天下的高度看元代南北儒学的不同特点，又能以纵深的视角看许衡和吴澄各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阐扬，立意上深刻地展现对多元文化并存社会现状综观后的宏肆，立论上更不乏博观之后的约取和精准，以“其用也弘”、“其及也深”来分别评价许衡和吴澄在元代儒学史上的意义，的确是不易之论。元统元年（1333）八月，虞集以目疾甚深回到江西临川，揭傒斯成为其时公推的最优秀的官方撰笔人。对于揭傒斯的时代文望，黄谱认为“文事与时而奋，恒在乎重熙累洽之余。惟养之厚，而用之不函，故其望实弥久而益著”，“非侥幸于一旦坐致显融者可同日而语也”，^{[23] 册 30, 182} 欧阳玄也承认：“古称良史造物忌，予夺是非擅万世”，于是“国家典册及功臣家传、赐碑，遇其当笔，往往传诵于人。四方释老氏碑版，购其文若字裹及殊域”。^{[22] 303, 300} 至正三年（1343）终于开修的《宋》、《辽》、《金》三史，揭傒斯成为执笔总裁官，蔚为虞集之后的文坛之望，黄谱总评揭傒斯云“公以庶士起远方，而徊翔于清途三十年，晚乃蔚为儒宗文师”^{[23] 册 30, 182} 是为确论。揭傒斯与虞集、范梈、杨载合称“元诗四大家”，又与虞集、黄谱、柳贯合称“元文四家”。范梈去世较早，名声上不能与虞集、揭傒斯相比，但也为文雄健，主张斯文之作当包举天下“出门而瞻望泰山、黄河，以洗穷乡之卑陋”。^{[24] 291} 其学生傅若金、危素即继承其志趣，享誉一时。傅若金不仅深得范梈文章之旨，而且游学于虞集、揭傒斯之门，是虞、揭辈深相期许的晚生后辈。在这些虞、揭、范等同乡前贤的影响下，傅若金在作文上也认为应该“捐去金人龌厉之气，一变宋末衰陋之习”，至“通都大邑”，见“文物之会”，立足天下多元文化现实，“力追古作，以鸣太平之盛”。^{[24] 258} 可惜，傅若金与他的老师范梈一样年寿不永，过早辞世，接续虞、揭，主持馆阁的是危素。

危素来自江西临川金溪，是吴澄最为器重的学生，吴澄的年谱即交付危素撰写；是虞集非常欣赏的师弟，虞集曾夸誉危素云：“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则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请从太朴（危素字）而为之执御焉”^{[25] 册 26, 185}；是范梈的及门俊彦，范梈曾有诗赞危素的胸襟、才学云：“危君英妙年，独往志千载。天马出名驹，空行见风采”。^{[26] 册 26, 406} 至正四年（1344），揭傒斯去世，危素在《宋》《辽》《金》三史的修撰中挑起大梁，宋濂描述危素的著述重要影响云：“公复移书执政，请修《宋》、《辽》、《金》三史，乘传行宋两都，访摭闽遗。书成，公之力居多。顺帝知公问学渊深，特命注《尔雅》、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为之，不数月而成。”^{[27] 1, 270} 危素作文以虞集为范式“贯通经史，而博涉于百氏，故犁然各尽其蕴，而无所偏滞”^{[7] 1, 176}，在多元混融的创作理念支撑下，务实而博观，《明史》曾著危素修史事云：“纂后妃等传，事逸无据，素买场饼馈宦寺，叩之得实，乃笔诸书，卒为全史。”^[28] 四库馆臣认为，危素文章“气格雄伟，风骨遒上，足以陵栋一时”，并非过情之论。如果说揭傒斯作为《辽》、《金》、《宋》三史的执行总裁官是对他之前撰述成绩的肯定的话，那么深厚的教育、游学背景，再通过《辽》、《金》、《宋》三史从江南访书到主笔撰写等过程中的付出，危素确实藉着三史的修撰，使自己淬炼成为元末文章大家。宋濂认为危素“至正中，独以文鸣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27] 1, 274} 诚所谓“虞揭凋零玉署空，堂堂至正独推公”^[29] 危素堪当虞集、揭傒斯之后的接班人。

事实上，除了馆阁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外，江西乡贯文人在方外、山林中亦以多元融合的创作理念而著名于一时。方外力量中，前所述玄教教主吴全节以不拘一格、接游天下的风范而令其诗文“太和之气贯彻于身，表里冲融”。不仅有吴全节，还有来自江西南昌的、临济宗禅师大诩。作为元文宗时期被特诏为大龙翔集庆寺开山第一代主持，政治际遇“冠于东南之丛林”的方外人士，大诩深受时代多元文化风气浸染，“吸江海于砚席，肆风云于笔端，一坐十年，应四方来者之求，则一代人物之交见于篇章简什者，殆无虚日”，故其诗文“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宏轩昂，蛟龙起跃”，^{[7] 590} 确有不俗之处。民间力量中，尤其值得讨论的是吴澄。作为优秀的理学家，吴澄不同于与自己齐名的北方理学家许衡，他文集“哀然盈百卷”，“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正像四库馆臣所说的那样，“据其文章论之，澄其尤彬彬乎！”^[30] 吴澄在哲学上主张和会朱陆，在文学上与同学程钅夫、学生虞集、危素等人一样以多元融合的理念论文、作文，且看如下一段吴澄的文章：

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予尝原其初矣。唐之时，闽地肥衍丰裕，民鬻其所安，溺于其所乐，莫或以仕宦游观上国为意。……泉之人有土著，有侨寓，大概没溺于利，而同或以义理淑其心。倘能以常垂相之化一道者化一郡之民，使之人人知学，虽未能离乎殖货者，亦不至没溺之深。则非但民风玉变而易治，当今进士科取士不限以疆界，不拘以种类，皆可以得大用，将见泉之民以进士发身如欧阳詹者数十百，而羽仪乎天朝，其视终身没溺于货利者，相去岂不万万哉！^{[31] 册}

这段文字是吴澄为即将前往泉州做录事官的同乡姜曼卿写的送别序。泉州是元朝第一个市舶司，源于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口岸意义，海陆中外货物每天往来于泉州，故泉州之民往往机巧趋利。作为理学家、教育家，吴澄期望乡贤能使泉州民风变易，大用于国家，但同时也承认泉州乃天下番货、别域巨商云集最多者，又以土著、侨寓混居特征为典型，故而只期望姜曼卿能令民众“不离乎殖货者，亦不至没溺之深”。与此同时，吴澄在文章中还指出国家用人取士“不限以疆界，不拘以种类”，这实际还隐隐期望姜曼卿能变化当地侨寓者，令其捐才华于天朝。种种表述，切实而深入，却非常能体现出作者胸襟天下，承认多元文化并存社会现状的坦荡和期待有所作为的自信。

吴澄一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学问、思想能得时代风气浸润，且借时代风气而令其学问、思想“远而彰、尊而明”。^{[6] 册 28, 548-549} 在元代，有许多江西人并未身居高位或者基本生活在江西，却往往能秉持深省顺处理念，努力以观风务实、多元包举的态度，以平易正大之作黼黻时代。比如江西人杨允孚以布衣而远走天涯，至于上都，成为上都马宴上的食尚官，并以亲见亲闻写下《滦京百咏》；再如江西乡绅傅习、孙存吾在退归江西的虞集的影响和参与下，以包举天下，备见时代风格的理念，行于四方，遍采时贤作品，编著当代诗选《皇元风雅》，所选作品上及朝廷制作，下披山林高风，而其以平民尚能有立足现实，不拘高下、内外的胸襟，令人想见其时务实观风、多元包举理念在江西人心目中影响之深。

应该指出的是，江西乡贯作家影响最著之时，大约在皇庆二年（1313）-至正八年（1348）。这段时间，乃元王朝携一统南北、交通天下的余势，国家颇称自信、强盛之时^①。生当其时者，不仅有江西乡贯作家慨然而兴奋厉之念，浙江乡贯作家也毫不逊色。其前有宋元之际的戴表元，以振起斯文为己任，其朋友赵孟頫更深憎声教不通所导致的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欲借复古而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文化交汇融合特征，形成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②⑨}其弟子袁桷更以多元融合之态度，与虞集、马祖常、王士熙等人迭相师友，倡导文风变革；再有浙东婺州文人群黄谱、柳贯、胡助、吴师道等不仅以雄文声闻一时，又言传身教，令其身后浙东弟子宋濂、王伟、胡翰辈蔚为明初作家之首。而浙江乡贯作家之外，黼黻一时的作家群中，尤其以马祖常、萨都刺、迺贤等为代表的西域文人，见诸其作品之“奇怪物变、风俗嗜好、语言衣食有绝异者”^{[7] 405}，风貌多元并峙，尤难历数。而其他如元明善、张养浩、李术鲁种、张起岩、许有壬、欧阳玄、宋本、宋裂等等，皆一时著名作者。江西作为元代唯一一个人口突破千万的大省，海纳四方移民，最得风气之先，从朝廷馆阁到山林方外，从赫赫朝士到寂寂布衣，多元文化并存的包容理念泯然融于江西人的思维中，使江西乡贯作家成为一股合力，在有着蒙古、色目、女真、契丹、宋人、高丽人等多民族、多地域作家参与的元代文坛挺然崛起。而随着程巨夫（1318）、范梈（1330）、吴澄（1333）、揭傒斯（1344）、释大诰（1344）、虞集（1348）、吴全节（1350）等大家的相继离世，更随着元朝的逐步衰落、与外界关联能力的减弱，人们包举宇内域外的心态逐步收缩，元末杨维禔为首的东南文坛力量崛起于东南，并逐步与京师馆阁力量抗衡，元代创作风气大变不可逆转了。

参考文献：

[1] 李纲. 条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状[M]//永路. 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①按：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曾感慨写道：“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李修生. 全文文.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5 年，第 58 册，第 301 页。

②参见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文艺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66-75 页。

[3] 程钜夫. 程钜夫集[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

[4] 虞集. 送李扩序[M]//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5] 程若庸. 吴澄私录跋[M]//苏大刚, 李勇先. 中华大典 • 文学典 • 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南京: 凤凰出版社 1999 : 418 .

[6] 揭傒斯. 大元敕赐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垂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溢文正吴公神道碑[M]//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7] 虞集. 虞集全集[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8] 朱思本. 輿地图自序[M]//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9] 琐非复初. 中原音韵序[M]//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10] 黄文仲. 大都赋[M]//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11] 戴良. 皇元风雅序[M]//李修生. 全元文.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12] 宋濂.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3] 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74 .

[14] 赵访. 邵庵先生虞公行状[M]//李修生. 全